



新四军第三师珍惜民力厉行节约

抗日战争时期，以黄克诚为师长兼政委的新四军第三师，兼苏北军区，辖盐阜、淮海两个军分区。在华中局和军部的领导下，经过艰苦努力，开辟和发展了苏北抗日根据地。江苏省档案馆珍藏的苏北根据地档案资料和先锋杂志、《真理》、《盐阜报》等抗战时期的期刊报纸，生动记载了新四军第三师为了减轻人民负担，坚持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，努力增民利、减民负、惜民力的动人故事。

顾俊

开展大生产运动

1942年，为了克服日寇“扫荡”和国民党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，第三师遵照上级指示，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“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”号召，利用战斗空隙，除帮助驻地农民生产劳动外，因地制宜开展生产运动，既改善自己的生活，又减轻群众的负担。1942年第九期先锋杂志登载《三师政治工作指示》，要求“部队在不妨碍战斗任务和本身训练之下……应专门有计划地协助各地进行耕种和收获工作”。一声令下，自机关到连队，普遍开展了生产运动，他们还帮助群众进行日常劳作，如修理道路、打扫卫生、挑水积肥，农忙时帮助耕种收割。这种爱民利民举动，受到苏北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，感动了无数群众。1942年10月21日，洪学智在《盐阜报》上发表文章《检讨及今后的展望》，动情地写道：“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曾向我说，‘你们军队帮助老百姓收割粮食，不吃饭又不不要钱，天底下是死也找不到像你们这样好的军队了！’”

1944年1月20日，第三师发布《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》指出，“发展生产是党中央十大政策之一，是我师当前中心工作任务之一，是克服困难，减轻人民负担，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”，要求各连队各机关单位普遍进行种菜、种麻等。种菜是用于改善部队伙食，要做到供给本单位三分之二的白菜，从阴历五月一日起菜金即减少一半；种麻是用以供打草鞋之用，补充鞋子之不足。训令强调，“动员和组织为发展生产中之重要环节，各级首长要负责推动，亲自动手”。

各部队迅速行动，所属第七旅根据自身实际提出具体要求：“各单位可在驻地周围进行小规模生产，副业（油坊、磨坊、做豆腐、做粉条、喂猪等）为辅，解决每人每天所需要的五钱油、四钱盐。”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大生产运动，苏北根据地的经济得到复苏并有所发展，缓解了财政拮据的状况。1944年11月15日，《盐阜报》发表黄励华《师直生产初步总结》，“半年来的生产收获：蔬菜176190斤，平均每人生产185斤，初步地改善了部队生活”。看到新四军与老百姓一块苦，驻地的私塾先生赞许道，“当兵搞生产，亘古未有，新四军真乃仁义之师”。

厉行勤俭节约

在发展生产的同时，第三师还提倡厉行节约，反对贪污浪费。黄克诚说，“我们大生产要搞好，节约也要搞好，生产和节约要同时进行，把它们结合起来，才能解决我们的供应困难，才能更大地减轻苏北人民的负担”。1942年第8期《真理》刊登了黄克诚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政治工作报告，强调“应当采取各种方式，经常地进行反对旧社会习气传染，反对贪污腐化，提倡爱护公物，提倡节约运动”。

为了确保节约运动取得实效，各级机关制定了节约口粮的标准，提倡吃糙米杂粮，强调一切军用器材、卫生用品和人员编制都要严格控制。师首长带头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。黄克诚费尽心思、精打细算。他亲自到农户的磨坊里，了解粮食的加工过程和出粉率，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，要求供给部门严格开源节流，提高供给效率。他还提出节约一两粮、一寸布的号召。为了节约布料，他倡议三师的军服上衣去掉翻领，帽子去掉围圈，裤子由宽大的

中式裤腰改为西式小裤腰。新四军军装本来就是土布做的，加上没有衣领和衣兜盖，就更土了，成了标准的“土八路”。战士们一开始有些想不通。黄克诚劝导道，现在的“土”，为的是将来的“洋”。去掉帽檐和翻领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大碍，可对人民却有很大好处。全师几万人，一人节省一二尺布，可以多做多少军服啊！

1944年4月10日，《盐阜报》披露了副师长张爱萍的节约计划，包括诸如省吃每天规定粮食的四分之一，今夏少领一套单军衣裤，今冬不领新棉军衣裤、棉被、毯子及袜子，用旧纸自做信封，不点洋烛，不要牙粉牙膏刷牙等内容。整个计划，都落在细节上，绝无半点敷衍。在各级领导的示范带动下，节约光荣、浪费可耻在第三师蔚然成风。大家都十分爱惜人力物力，个人日用品和津贴也都尽量节省。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说，“全军7个师，第三师人最多，花钱却最少，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”。

珍惜民力爱护群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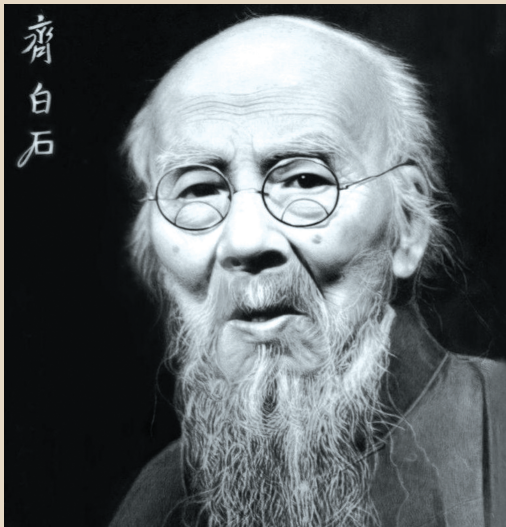
1944年1月，第三师兼苏北军区专门发布《关于爱惜民力的训令》，号召“全体主力及地方武装今后对民力应加以爱惜，各种劳作应自己多多动手”“平时食粮、柴草在三十里以内者一律自运，在三十里以外者尽量自运”。强调“以后一切部队或机关，凡须请民夫者应呈报团（或总队）政治处核准，领取民夫证始能向地方政府请得民夫”。师首长说到做到，率先垂范，黄克诚清晨拾粪、张爱萍长途背粮，在当时均被传为佳话。

为了防止与民争利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，第三师强调“在生产运动中需严格注意爱护群众利益，如租地、借工具等不得对群众有所妨害”。第七旅明确提出，“必要时可与老百姓换工，但要注意不使群众吃亏，不勉强，并应取得上级允许。参战的民夫、向导，要很好解释、鼓励、安慰，要告诉他隐蔽身体，危险地方不要派去，并有保护责任”，体恤群众的情怀溢于言表。

1944年2月，黄克诚在师直干部会上作了题为《一件老事情》的拥政爱民报告。他说，“老百姓如果背着很重的负担，得不到实际的好处，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是说不动的”“谁再浪费民力谁就是犯罪，再犯浪费民力之罪的，党内要开大会斗争”。对人民利益要加以爱护，他举例说，“打破老百姓一只碗就值二十几块钱，他做一天工，得二斤稻头，还抵不上一个碗。所以我们对老百姓物件要加意爱护和爱护自己的一样”。1945年4月，阜宁战役获胜后，为鼓舞士气，准备召开祝捷大会，参谋人员原来把会场选在一块麦田里，黄克诚知道后明确表示不同意，后来把祝捷大会改在了乱草滩上。

新四军第三师从一桩桩小事、一个个细节入手，把关心群众、珍惜民力、厉行节约的要求落到了实处，树立了党和军队的良好形象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。 据《学习时报》

齐白石的“第五知己”



1929年4月，“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”在上海举办，朱屺瞻的国画《墨荷》《寒林》、油画《春寒》《劳苦》《静物》等作品入展。美展上，他见到一幅署款“白石”的山水画作，深感厚拙奇崛，尽显大家气象，但不知道“白石”者为何人？

约半年后，好友徐悲鸿在上海举办画展，朱屺瞻发现其画作上所钤的一方闲章，刀法酣畅沉着，逋峭雄逸，叹为神品，便向徐悲鸿打听刻印者是谁。徐悲

鸿告诉他，刻印者是齐白石，又极力推崇齐氏的书画篆刻。朱屺瞻经济优渥，他辗转荣宝斋上海分号，按润例向齐白石订刻。此后，朱屺瞻与齐白石翰墨频通，交谊日深。

1936年，朱屺瞻以“梅花草堂”为题，向同道好友遍求“梅花草堂图”，齐白石绘制了一幅《梅花草堂图》，并书写了书法绝句：“白茅盖瓦初飞雪，青铁为枝正放葩。如此草堂如此福，卷帘无事看梅苑。”第二年8月，日军入侵上海，朱屺瞻义愤填膺，驰书齐白石，表示“虽无力救国，必当以清白处世，劲节自励，决不作俯仰随流之人”，请齐白石篆刻“劲节冰霜”“傲寒”“师竹”“耐岁寒”“竹师梅友”“崛强风霜”等印，以明志节。

1938年，朱屺瞻历经10年时间，共定制了齐白石篆刻的40多方印章。同年暮春，齐白石为朱屺瞻绘制《墨梅图》，又篆刻了“屺瞻欢喜”“太仓人”“心游大荒”等印。其中，“心游大荒”成为朱屺瞻一生不断进取的艺术信条。

1943年，齐白石以“知己有恩”印蛻赠与朱屺瞻。截至1944年，朱屺瞻已拥有齐白石的刻印60多方，他因此自拟书斋名“六十白石印轩”，自号“六十白石印富翁”，并特意请白石老人为他镌刻“六十白石印富翁”印。齐白石快意操刀，又刻下边款：“屺瞻仁兄最知予刻印，予曾自刻‘知己有恩’印，先生不出白石知己第五人。” 周惠斌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徐伯昕手录邹韬奋遗言

徐伯昕与邹韬奋是享誉中国现代出版史的出版家与社会活动家。1943年深秋，邹韬奋因耳癌病情加重，健康状况每况愈下。据徐伯昕后来回忆：“先生疼痛难忍时，用双手抱颈，身体翻转起伏，呻吟不止，泪水夺眶而出。”

1944年6月2日，邹韬奋自感时日无多，要求口述遗言。徐伯昕立即备好纸笔，在病榻前亲笔记录下了这份珍贵的《遗言记要》。遗嘱分为五个部分：关于临终处理、关于著作整理、关于家属布置、关于政治及事业意见、关于其他方面。邹韬奋在遗嘱中详细交代了子女教育安排：“如二宝愿习医学”“小妹爱好文学”，甚至细致到“伦敦购回之英文本古典政治经济史与马恩全集”的藏书处置。除了对生的渴望，“很想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”，更令人感动的是邹韬奋的政治遗言：“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，如其合格，请追认入党，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。”这份长达千余字的遗嘱，真实记录了一位革命战士生命最后的理想信念。

1944年7月24日，邹韬奋在上海病逝。徐伯昕与沈粹缜等人为其秘密办理了丧事。此后的35年间，徐伯昕一直将这份遗嘱珍藏在身边。1979年，在邹韬奋逝世35周年之际，徐伯昕撰写长文纪念，首次公开引用了韬奋的遗言。

这份由邹韬奋口述、徐伯昕手书的珍贵文献，是传承韬奋精神的重要载体，也是两位革命战友生死情谊的永恒见证。 时小明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